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No.14

比较政治学研究

总第 14 辑

2018 年
第 1 辑

主编 李路曲

主办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政治学研究》编辑部

马雪松

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项学科史考察

邢瑞磊

宏观与微观的融合：比较政治学研究路径的逻辑调适与演化

曹 胜

国家自主性：从“分殊制衡”到“嵌入协同”

谭 融 王子涵

论印度政治发展道路的探寻

李 江 储建国

马来西亚执政联盟的非对称协商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集人文社科之思 刊专业学术之声

刊 名：比较政治学研究

主办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政治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李路曲

执行编辑：陈 媛 李 辛 吕同舟 周幼平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No.14

学术委员会（中方学术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宁 骚（北京大学）

张小劲（清华大学）

李路曲（上海师范大学）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

杨雪冬（中共中央编译局）

陈 峰（香港浸会大学）

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

徐湘林（北京大学）

曹沛霖（复旦大学）

常士闾（天津师范大学）

景跃进（清华大学）

谭君久（武汉大学）

〔英〕克特·理查德·路德 Kurt Richard Luther （英国基尔大学）

2018年第1辑 总第14辑

集刊序列号：PIJ-2018-305

中国集刊网：<http://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http://iedol.ssap.com.cn/>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总第 14 辑

2018 年
第 1 辑

比较政治学研究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No. 14

主编 李路曲

主办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政治学研究》编辑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卷首语

本辑是《比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辑（总第十四辑），共收录了十二篇文章。从主题上看，既有关于学科史、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问题的理论观察，也有围绕国家自主性、民主理论的系统反思，还有立足国别问题的具体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诸多学科领域的学者纷纷汇聚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旗帜下，形成了纷繁绚烂的学科图景。为了全景式地进行展现，马雪松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置于社会科学演进及各学科交融的脉络之中，通过考察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中新旧制度主义路径的演变历程，以及新制度主义四个主要流派在政治科学中的确立过程，跟踪评价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与方法更新，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了整体把握。

现代比较政治研究以世界各国实现现代性的途径为问题核心，通过比较方法在“共时性”因果分析与“历时性”次序组合之间取得平衡结果，寻找与价值关联相一致的发展之路。邢瑞磊立足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自觉”维度，剖析了当前比较政治学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和理性主义三大理论范式的内在逻辑，进而探讨在确立现代性道路这个核心问题的引导下比较政治学“三大理论范式”融合的必然性。

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探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当前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关于定性与定量“两种传承”的争论长期存在，但立足同一议题下对两种方法进行对比的文章倒不多见。释启鹏、陆屹州关注到这一点，以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五个相关假设，分别用定性比较分析与逻辑斯蒂回归进行检验，并得出结论：在中等规模样本的研究中，定性比较分析在识别必要条件以及条件组合上具有独

特优势。这对于强化两种方法的理论认识具有参考价值。

国家自主性作为国家回归理论的核心概念被提出以来,作为国家中心理论范式进行社会政治分析的重要理论范畴,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科学分析的诸领域。曹胜对国家自主性的理论变革进行梳理,提出其经历了从“分殊”到“嵌入”的变革历程,前者主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凸显国家与社会在组织特质上的差异对立;后者则在国家与社会分殊基础上,考察国家对社会的嵌入,强调国家的嵌入式自主能够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罗伯特·达尔是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领域的经典学者。牟硕经过观察发现,学界当前主要关注达尔的多头政体理论,但对其程序民主理论的关注偏少。因此,他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通盘审视,重点描述了狭义的程序民主、有着民众的程序民主、有着民众并考虑到议程的程序民主以及完全的程序民主四种类型,为学界全面了解达尔的民主理论提供了素材。

在国别政治研究领域,诸多学者围绕政治发展、民族共同体建构、异质化社会转型等问题展开了多视角的阐释。谭融、王子涵梳理了印度探寻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结合自由主义之路探寻、社会主义之路探寻及本土政治发展模式探寻几方面解析其政治发展路径,进而揭示印度乃至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及其内在逻辑。

赵银亮、岳晓璐以缅甸为个案,挖掘地区一体化、立宪主义和国内政治发展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带来外部市场准入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通过对一国政治经济联盟的影响,改变了执政联盟对于财富分配、政治结构、个人权利等制度性变革的预期,并最终推动政治发展。

李江、储建国将马来西亚巫统与联盟其他成员党之间的协商方式界定为非对称协商,发现这种方式对妥善地解决成员党间利益矛盾、实现联盟在不同阶段的共同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对该方式的运作、特点及优势进行了深入描述。

彭庆军认为哈萨克斯坦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就是在族群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前者试图通过“哈萨克化”

建构哈萨克族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后者试图通过“哈萨克斯坦化”建构新的包含所有哈萨克斯坦公民的“哈萨克斯坦人”。当前，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所有多民族国家均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徐国冲、霍龙霞以土耳其新宪法为依据，在马修·S. 舒加特、约翰·M. 凯里等学者量化测量方法的基础上形成量表评估了土耳其总统的权力，并将其与美、俄、法、韩等国进行比较，梳理了土耳其总统制的特点。这一研究为理解土耳其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提供了素材。

马正义以“族群分裂社会何以实现平稳民主转型”为追问，立足南非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政治精英的理性引导、渐进的转型速度、转型过程中各方的参与、武装力量的有效整合以及理性的制度设计等因素是其避免大规模政治冲突、实现和平转型的内在逻辑，也为其他族群分裂国家提供了可能的借鉴。

此外，2017年12月16~17日，本刊编辑部和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共同主办的“‘比较政治学的新发展’暨第七届比较政治学论坛”在天津召开。杨端程对此次会议的过程和学者观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为读者了解此次会议提供了经验材料。

《比较政治学研究》编辑部

2018年6月

目 录

001/ 卷首语

- 001/ 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项学科史考察 马雪松
- 037/ 宏观与微观的融合：比较政治学研究路径的逻辑调适与演化 邢瑞磊

- 056/ “两种传承”的实证检视：以欧洲极右翼政党兴起为例
- 释启鹏 陆屹州

- 080/ 国家自主性：从“分殊制衡”到“嵌入协同”——理论变革与实践意义 曹 胜

- 098/ 达尔的程序民主理论探新 牟 硕

- 115/ 论印度政治发展道路的探寻 谭 融 王子涵
- 132/ 地区一体化、立宪主义与缅甸政治发展 赵银亮 岳晓璐
- 153/ 马来西亚执政联盟的非对称协商研究 李 江 储建国
- 174/ 哈萨克斯坦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重构 彭庆军

- 194/ 比较视野下的土耳其总统制研究 徐国冲 霍龙霞

221/ 族群分裂社会何以实现平稳民主转型：以南非为例 马正义

244/ “比较政治学的新发展”暨第七届比较政治学论坛会议综述
杨端程

261/ Contents

268/ 《比较政治学研究》投稿须知

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一项学科史考察^{*}

马雪松^{**}

内容摘要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不仅应当从自身学科的范式转换和新旧嬗变角度加以考察，而且其产生和发展历程还处于社会科学演进及各学科交融的脉络之中，多学科与多源流的分析视野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在推进前沿发展、延展研究范围、更新研究方法方面的有益成果。现实主义取向的理性与经验的划分、实证主义取向的解释与诠释的划分、个体主义取向的结构与能动的划分构成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背景，并在塑造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形态和格局的同时为其提供了动力。通过考察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中新旧制度主义路径的演变历程，以及新制度主义四个主要流派在政治科学中的确立过程，可以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与方法更新进行跟踪及评价，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整体把握。

关键词 新制度主义；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学科史

一 引言

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4CZZ036）的研究成果。

^{**} 马雪松，政治学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与方法。

展,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组织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公共政策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及相关成果,日益汇聚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旗帜下。尽管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之间一直存在内容深化与内在分化伴生、互相争鸣与互为借鉴交织的情形,但是对于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许多制度研究者来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这一身份共识已经形成并不断得到巩固,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也促进了理论建构水平的提升。然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者在扩展研究领域并深化研究主题时,对一些核心议题缺乏系统全面的回顾反思,特别是同早期阶段相比,从社会科学发展以及多学科交融贯通角度对新制度主义进行审视的研究旨趣依然有限,导致不少问题有待澄清或深入阐释。

举其要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在制度范畴与研究路径上的歧异见解和多重取向,并未按照先前奠基者或集大成者在各自宣言中预测的那样实现充分融合;新制度主义理论范式对自身新陈代谢过程中新颖性的强调,往往掩盖或割裂了它们同此前发展阶段以及宏观学科背景的内在关联;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群体分布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之下的多个分支学科,就当前丰富的理论成果与持续扩展的应用研究而言,不同学科和相异领域的研究者能否一概归入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仍存一定疑义;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与组织理论先后经历了观念转向、认知转向、语言转向,但这并未受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同等程度的关注和积极回应。针对以上问题,从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与多学科的板块运动角度审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避免将分析视域局限于政治科学内部,这样的尝试无疑能够提供富于启发性的认识,还有可能消释以往研究中的某些成规定见。

事实上,关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容更新与流派演进的一些学者,在界定制度内涵和制度主义研究取向时表现出了开放的态度,这为社会科学分析视角的运用奠定了必要基础。例如,马奇(James March)与欧森(Johan Olsen)在《牛津政治制度手册》的序章中指出,政治科学中的制度主义主要指政治制度研究的一般路径,包含关于制度特征同政治能动性、偏好及变迁之间关系的一套理论观点和假设,制度主义强调政治制度的内生属性与社会建构的特点,主张制度不是追逐私利并工

于算计的个体行动者维系相互均衡的一纸约定，也不是社会各派势力彼此争雄的竞技场，而是政治生活中由结构、规则、标准运作程序构成的能够部分发挥自主作用的混合体。^① 兰恩（Jan-Erik Lane）与厄尔逊（Svante Ersson）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偏好与后果》中指出，新制度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分析框架，它在推进理论发展的意义上类似自然科学的范式革命，“通过向社会科学提供新的研究模型而塑造社会科学的各类概念”。^②

一方面，部分政治学者意识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不仅应当从自身学科的范式转换和旧嬗变角度加以考察，而且其产生和演进的历程实际上处于社会科学的广泛背景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古丁（Robert Goodin）与克林格曼（Hans-Dieter Klingemann）基于学科整体发展视角认为，政治科学的新制度主义运动代表了行为主义研究传统与受到经济学影响的理性选择分析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建立在反对理性选择分析的组织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的基础上，新制度主义的多样性“有能力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研究框架”。^③ 法尔（James Farr）与艾德考克（Robert Adcock）等学者从英美政治科学的发展历程和内在联系角度，探讨了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与新制度主义在现代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系谱当中如何相互影响。^④

另一方面，从事制度研究的部分社会学者与经济学者意识到多学科视野的重要性，并在推进前沿发展、延展研究范围、更新研究方法上积极探索。举例而言，一些社会学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者基于社会科学的整体视域，关注政治生活中观念的角色和功能。^⑤ 倪志伟（Victor Nee）

① R. A. W. Rhodes, Sarah A.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

② 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Performance and Outcom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

③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4 – 25.

④ Robert Adcock, Mark Bevir and Shannon C. Stimson,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Anglo-American Exchanges since 188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 Daniel Beland and Robert Henry Cox, *Idea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与布林顿 (Mary Brinton) 等关切经济学成果的社会学者,主张应从社会学本身而非组织分析出发吸纳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从而扩展古典社会学与当前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围。^① 社会学者阿布卢廷 (Seth Abrutyn) 通过梳理古典社会学以及功能主义与演化制度理论的研究议题,指出社会学的制度主义应回归宏观社会学传统并切实回应行动者的选择问题。^② 以坎贝尔 (John Campbell) 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者,关注比较制度分析与新制度主义自欧洲经济社会学与英美政治科学内部发展至今的演进动力,并从历史进程的宏阔视野强调将资本主义议题再度纳入制度研究。^③ 制度经济学者霍奇逊 (Geoffrey Hodgson) 从社会科学一般性理论与特定性理论的关系角度,论述了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由于忽视早期经济学特别是传统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历史特性,而无法有效解释那些具有历史根源的现实问题。^④

二 制度研究的社会科学背景与脉络

社会科学建立在现代性开启以后的思想分工和知识体系之上,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对现代人类社会知识问题与现实议题的关照和回应。现代主义构成了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提供系统性、预测性与批判性知识也是社会科学众多分支学科的远大抱负。社会科学在体制化和学科化的历程中,很大程度上同自然科学一道保留了先前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对客观世界及人类社会具有唯一确定性、精准性与真实性的追求,而且呈现出强烈的二元论倾向。社会科学各学科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情感、意

①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Seth Abrutyn, *Revisiting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Putting the “Institution” Back i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③ Glenn Morgan, John L. Campbell, Colin Crouch, Ove Kaj Pedersen and Richard Whitle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④ Geoffrey M. 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2001.

识与经验、文化与自然、事实与价值、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整体与个体、同一与差异、连续与断裂、中心与边缘、内在与外界、公共与私人等议题上表现出具有持续性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塑造社会科学形态和格局的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动力。将新制度主义置于社会科学脉络之中，可以发现社会科学富于重要性和启发意义的研究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现实主义取向的理性与经验的划分、实证主义取向的解释与诠释的划分、个体主义取向的结构与能动的划分。

（一）现实主义取向的理性与经验的划分

近代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以笛卡尔（Rene Descartes）与培根（Francis Bacon）各自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和先验主义的攻讦作为发端。理性主义主张具有思维能力的个人可以凭借直觉意识、演绎推理和分析归类而辨别真实并增进知识，这不仅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道德鼓舞力量，还巩固了科学研究的基础。经验主义源自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通过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革命性的科学定理而发扬光大，定量化的观察实验与数学化的论证分析也衍生为现代主义的科学方法，使自然科学区别于并逐渐摆脱自然哲学。理论或定律往往首先出自某种直觉和相应假设，从而启动后续的观察和实验，所以科学方法也被视为对于直觉的证实、否定或补充，兼有理性主义的直觉性与经验主义的实验性。然而，社会科学中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长期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经验主义批评理性主义离开官感的认知越来越远而几近荒谬，理性主义批判经验主义对官感知越来越依赖而几近牵强，现代西方来个炒什锦，用上了理性主义的数学范式和经验主义的致用导向，使求真变成了一项数据化的功利活动”。^①

近代科学事业在理性与经验的张力之间向前发展，但社会科学的现实主义取向日益占据要津，强调社会科学不能满足于仅仅提出某些有趣的推测，而应当致力于成为经验性的研究，理论与解释必须基于真实世

^① [加] 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第 217、242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

界的可靠观察,并以自然科学作为效法的楷模。^① 社会科学的现实主义运动在批判自然科学的沙文主义并支持自身方法的特殊性时,也经常强调社会科学作为客观的经验科学应拒绝运用直觉方法。^② 在经验主义的量化分析当中,研究者试图严格分析现象之间的关联,尽管“对硬数据的要求可能会使研究问题产生偏离,且限制了研究者的理解和感知能力”。^③ 在经验主义凯歌高奏的背景下,由于通过动机来理解行动十分困难,研究者更多地将合理行动界定为依据有效经验来确立合适目标或选取恰当手段,并由此实现既定目标。这也意味着作为内在统率力量与主体自省能力的理性 (reason),其含义在经验意义上被替换为合理性 (rationality)。

(二) 实证主义取向的解释与诠释的划分

科学解释与人文诠释的二元论图式,可以追溯到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论述的人类可理解性模式与事物可理解性模式之间的对立,这实际上反映了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异。对于把人的行动和思维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来说,“人类行为可以被理解,是因为这些行为是理性的或者至少是有意的,人类行为是根据目的对方式进行的选择,无法用原因和规律来解释它,但是却可以理解它”。^④ 脱胎于古典社会学并因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的卓越贡献而趋于成熟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不仅像自然科学那样对世间万物的一致性规律满怀向往,而且认为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并无本质区别,两者遵循相似的方法论准则因而“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这也要求“社会科学在理论取向上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

① Steve Bruce, *Soci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8.

② [德]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第 ix 页,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

③ [法] 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文强译,第 26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

④ [法] 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第 13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体系”。^① 打上实证主义烙印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观察人类世界丰富现象和复杂事件所蕴含的为数众多的变量，借助科学研究手段以探究原因并揭示规律，而这一点又得到逻辑实证主义以及调查统计方法和数学模拟方法的强化。

与之相对，韦伯（Max Weber）发扬新康德主义哲学思想并强调古典社会学的诠释性传统，主张“不依赖于特定的和片面的观点而对社会生活或者社会现象绝对客观的科学分析是不存在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目的的特点是超越对社会群体规范的纯粹形式的考察”。^② 韦伯的理解性社会学认为，狄尔泰完全否定人类行动存在客观规律与因果联结机制的看法并不准确，进而指出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旨在“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对社会行动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③ 尽管如此，狄尔泰与韦伯的诠释性学说均强调包括直觉、观念、情感、记忆、欲望在内的人类生活的时间结构，关注能够引发他人情感共鸣的交往行动。之后在逻辑实证主义声势大振的时期，舒茨（Alfred Schutz）开创性地将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与韦伯的理解性社会学予以结合，主张“社会科学本身也只有在社会世界一般生活领域才有可能”，“社会科学建构的理念型特别是理解社会学建构的理念型，都必须同时符合因果适当性与意义适当性的要求”。^④ 伯格（Peter Berger）与乐格曼（Thomas Luckmann）在继承舒茨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核心观点，指出社会实在同时具有主观意义和客观真实这两重特性，知识对于个体的身份建构以及个体同社会结构的互动能够发挥关键影响，而两人的学术成果也成为社会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刘江涛译，第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德]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25页。

③ [德]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第4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奥] 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第314、318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